

# 新中国建立初期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蒋积伟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带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盲目流动与迁移;部分灾民被迫变卖家产和卖送儿女;灾民心理结构受到严重损伤;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党的土改、剿匪工作以及工业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为此,党和政府实施了系列救灾举措,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新中国建立初期;自然灾害;中国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3-0049-06

## 一、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灾荒不断。因此,重视灾荒史的记载和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就此指出:“灾荒,饥馑是毁灭人口的一种强大力量,而在科学不发达和抗灾能力不大的古代,灾荒的破坏力更是格外强烈。不幸的是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牍。”<sup>[1]</sup>但史书关于灾荒的记载关注的是如何赈灾和防灾,尚不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范畴。直到1980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灾荒史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及民国时期灾荒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历代灾荒及社会变迁的认识。但有关新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多是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灾情与救灾举措的一般性描述,无论研究的深度、广度,都远远滞后于中国古代与近代灾荒史的研究。

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认为:新中国建立前,“由于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制度的桎梏和阶级利益的冲突,妨碍或破坏着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时,人们便不得不俯首帖耳地承受着大自然的肆虐和蹂躏”,而这种情况,“在剥削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力的条件下,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规。”<sup>[2]</sup>李文海的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灾荒形成的社会条件。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自然条件是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形势下,自然条件的支配力更为显著。但自然条件向来不是导致灾荒发生的唯一决定因素。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的发生及影响的大小、破坏程度的高低还取决于人类社会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也有了很大差异。这或许就是学界对于新中国灾害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原因之一。但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中国长期的战乱、西方列强的入侵及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所造成的积贫积弱和人们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的局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尚不可能迅速得到改观,灾荒的发生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仍不可避免。因此,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灾荒史,不应只停留在一般性的灾情描述上,还应深刻指出灾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的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能丰富人们对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个特殊时期的认识,加深人们对当时社会变迁的了解。

此外,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人们注意。叶宗宝先生和夏明方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存在非人文化的倾向,在灾荒史研究中无视“人”的存在,涉及灾民生活往往以冷

**[收稿日期]** 2010-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BDJ010)

**[作者简介]** 蒋积伟(1980-),男,山东潍坊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冰冰的数据加以说明,涉及赈灾过程多侧重于论者心中的“国家”与“社会”,导致政府等救灾主体成为研究热点,而灾民则成了沉默的多数。而所谓自然灾害,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如果只有自然力量的变化(成灾体)而没有人类和人类社会(承灾体),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因此,在灾害史的研究过程中,应给予承载体——人类社会以极大的关怀。<sup>[3]16</sup>为此,本文力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建国初期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几点分析,以期丰富这段灾害史研究的内容。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灾情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增强了人们抗灾救灾的能力,但自然灾害对人们的侵袭和破坏并没有因此而敛迹,依然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2005年,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和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合编了《1949—2004重大自然灾害案例》一书,对新中国建立以来55年间53个重大自然灾害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灾害造成的损失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涉及1949—1956年的重大自然灾害就占7例,分别是:1949年发生在上海、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的第6号台风;1949年江淮及华北地区洪涝灾害;1950年淮河流域洪涝灾害;1951年云南剑川地震;1954年江淮流域洪涝灾害;1956年洪涝灾害;1956年第12号台风。1949—1952年的中国自然灾害状况见表1。<sup>①</sup>

表 1 1949—1952年中国的自然灾害

年份	水灾	旱灾	蝗灾	雹灾	风灾	霜冻	地震	瘟疫
1949	特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严重			一般
1950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1	一般	严重	严重	一般		一般	一般	
1952	一般	严重			严重		严重	

就1949年的水灾来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万亩,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498个县、市的部分地区。而到了1953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5123万亩。<sup>[4]1</sup>1949—1952年详细的因水灾损失情况见表2。<sup>②</sup>

表 2 1949—1952年中国因水灾损失情况

	成灾人口 (万人)	倒塌房屋 (间)	死亡人数 (人)	死亡牲畜 (头)
1949	4555	2066940	8109	26762
1950	3384	1391740	22985	3562
1951	6068	693934	9828	4824
1952	2760	283073	4433	5163

除水灾外,当时还遭受了春荒、旱灾、农业病虫害、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在当时百废待兴、千疮百

孔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三、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自然灾害对社会机体的破坏

自古以来,灾害就是相对于人的生存而提出的命题,是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对水、旱、地震等自然现象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sup>[5]</sup>灾害中有社会性的内容,是一种社会性事件。因此,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灾荒史不能不研究灾荒对社会的破坏作用。

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如导致大批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和加剧各种社会动乱,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疾病流行、家庭破裂,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最终导致社会机体破坏,影响或中断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人民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党和政府把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及缺乏对灾害的预见性,灾荒还是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1 自然灾害造成部分人口死亡和盲目外流

由于新中国救灾及时和得力,灾害造成的死亡和外流人口,与近代社会相比,已大大减少,但灾荒还是引起了部分灾民死亡和盲目外流。据统计,1949—1956年,全国因水灾死亡人口共计79025人。<sup>[6]354</sup>其中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水灾有3次,分别是1951年辽河洪水、1954年江淮洪水和1956年浙江风暴潮。关于盲目外流人口,从全国来看,1949年的春荒造成了179万盲目外流人口,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之多,直到1955年,由灾荒引起的盲目外流人口数字仍达52万。<sup>[4]267</sup>内务部《关于处理灾民逃荒问题的再次指示》指出:“去年有灾地区,曾发生灾民盲目外逃现象,前后竟达二百万人之多。”<sup>[7]155</sup>从各地来看,1949年10月,华东财委如此报告灾区情形:“山东灾情很重,台枣区域灾民已开始大批逃荒”,“皖北长江决堤河水泛湿,淫雨成灾,灾民450万,救济不及,大批逃荒”,“苏北发生水灾、风灾,淮阴分区大批难民开始向南逃荒。”<sup>[8]51-52</sup>逃荒现象在华北也非常普遍,1950年1月,宁河三区的逃荒户“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三十三。且仍在继续”<sup>③</sup>。1950年,仅路经南京一地的逃荒者每日达340人。<sup>[7]155</sup>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口的盲目外流对正处于恢复和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冲击是很大的,“不仅妨碍生产自救,增加社会混乱,而且往返遣返,浪费钱粮,灾民辗转道途发生死亡现象”<sup>[7]155</sup>。内务部《关于目前救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有些地区发生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逃荒,闹事。逃荒人中多数是青壮年,不少是乡、社干部、党团员,这就不但影响各大城市和工矿区的社会秩序,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灾区农业生产因劳动力出走而不能正常开展。”<sup>[7]115</sup>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有序开展,也为了更好地完成对城市各类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稳定城市秩序,国务院和内务部曾多次发布有关处理灾民逃荒问题的指示,指出:“盲目外流对本人、对农业生产、对国家建设都是有害的。”<sup>[7]157</sup>“在城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的农村人口,必须动员他们返回原籍,并且严禁流浪乞讨。”<sup>[7]158</sup>另外,为缓解灾荒带来的压力,有些地区采取了有计划的移民工作,如河北省自 1949 年 11 月 19 日至 1949 年 12 月 28 日,先后分 8 批向东北移民 14642 人。<sup>④</sup>

2 灾荒中变卖家产和卖送儿女的现象时有发生  
频繁严重的灾荒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使部分饥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妻子女儿。1951 年卖送儿女的数字为 667 人,1955 年有了大幅增长,达到 3424 人。<sup>[4]267</sup>仅以河北省的大城县为例,1950 年“大城一县卖女早婚者,即达一七〇起,夫妻失散者十一对,将孩子送入者十三起”<sup>⑤</sup>。1950 年 1 月,河北宁河三区“据五个村调查,拆房卖的五八九户,其中狮子庄村已拆卖百分之三十五。全村集市到处皆是卖家具衣服等物的,一根檩条换粮一二斗,一头驴买粮一石,狮子庄村已发生买卖婚姻三起”<sup>[9]24</sup>。1950 年初,河北省除通县专区较好外,其他重灾区牲口减少 40%~50%。<sup>⑥</sup>河北灾民的艰难生活不是个别现象,1951 年的广东省,截至 5 月初,据“6~7 县、2 市的不完全统计,处于饥饿中或濒于饥饿线上的就有 2755237 人”,“仅阳江县即有 16 人迫妻改嫁,12 人抛卖儿女”。<sup>[9]24</sup>这种变卖家产和卖送妻儿的现象,不仅干扰了 19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等运动,还影响了灾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 3 灾民心理的损伤

频繁的自然灾害,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条件匮乏,当灾害再次来临时,民众缺少救灾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加重了灾荒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灾荒的频繁发生对当地民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变对人类心理生活的强烈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张皇失措,无所适从,

产生心理上的麻痹与震颤”<sup>[10]</sup>。因生活无着,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受挫情绪,心理结构出现损伤,相比较物质损害来说这是一种更严重的内在性灾害后果,影响到民众对抗灾救灾的态度。与灾荒相关的资料在记述这一问题时,大多用“失落”、“悲观”、“恐惧”来描述当时灾民的情绪与心态。1950 年 8 月,皖北遭受水灾的灾民“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痛哭,干部亦垂头流泪”<sup>[11]</sup>。1949 年,河北省“大水到来,群众悲观失望,思想极为混乱,夸大灾情,依赖救济的思想很为普遍。盲目逃荒,出门讨要的现象也普遍发生,更有的想吃斗争饭,或向中农强借粮食”,干部也失去信心,“青仓交县即有十九个区干部回家(为灾荒所吓倒脱产)。”<sup>⑦</sup>1950 年河北雄县灾区“大多数的村干部和群众惊慌失措,思想混乱,看到灾情严重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情绪,叫苦连天,大多数的村干部和群众准备逃荒和等待政府救济。……村政权垮台,村中形成无政府状态”<sup>⑦</sup>。这种状态无论对救灾还是防灾都是不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时的灾情。

### (二)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必然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破坏。新中国建立初期,严重的灾荒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灾后耕地面积减少。“历来灾荒,不但使农地在灾时无法利用,而且每经一巨灾之后,荒地面积势必增加。”<sup>[12]</sup>1949—1956 年,全国因旱灾造成的受灾耕地面积为 4526.6 万公顷。耕地大面积受灾,不仅减少了耕地面积,也降低了耕地的质量。以汉中地区为例,1954—1957 年汉中水灾频繁,所造成的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1953 年全区耕地面积 6784291 亩,1954 年只有 6721735 亩,占 1953 年的 99.1%;1955 年为 6709096 亩,比 1954 年减少 0.2%;1956 年为 6491469 亩,比 1955 年减少 3.2%;1957 年为 6366697 亩,比 1956 年减少 2%。如洋县茅坪乡 1956 年遇严重自然灾害,该乡原有耕地 4000 多亩,到 1957 年只剩下 2000 亩,减少 50%;宁强县大安乡 1959 年由于大旱,灾民外逃,荒芜土地 13110 亩。<sup>[13]56</sup>

耕地破坏还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灾民为了生产自救,部分山区群众砍伐树木为副业生产,有些灾民到森林附近垦种,甚至烧山,有些地方政府靠森林弥补财政问题,甚至提倡毁林开荒,解决耕地减少,粮食减产的问题。部分地区植树造林主要是速成林,解决烧柴问题,而生态林比例很小。汉中全区 1951—1958 年植用材林 2258636 亩,特用林(油桐、

油茶) 2864 939亩,而防护林才 1 161 397亩。<sup>[13] 39</sup>同时,救灾中发展副业如烧炭、栽培木耳、做农具、采原木等活动,都使大量的林木遭到破坏,其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严重,河床升高变宽,河流调节灾害的能力降低,泥石流等复杂灾害经常发生。

### (三) 灾荒对剿匪、土改等工作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鉴于灾害之频繁、规模和影响之大,以及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阶段和社会环境,抗灾救灾已不是一场独立的运动,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sup>[14]</sup>,它关系到新解放区的土改能否顺利完成,并与农业合作化具有互动的关系。

由于灾情严重,广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无力生产、陷于饥饿、惶惶不安、要求救济。而“匪特分子与少数不法地主,复趁机制造谣言,胁迫群众,组织暴乱,抢分公粮,烧毁公仓、袭击政府机关,杀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破坏生产,制造混乱”<sup>[8] 128</sup>。以河北省为例,1951年,阜平、曲阳两县的老区灾民,面对灾后“生活极为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更为严重”的局面,都抱怨党和政府“下了山忘了山”。<sup>[15]</sup>不满情绪的弥漫和扩散导致一些“群众性骚动事件”连续发生,如1950年华东灾区“六合县南圩、五子二新区六个乡,一月二十二日……二千余群众,以‘穷人买吃不买烧,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到仪征县胥浦区大安、安墩二乡投山破树,与当地群众发生械斗,互伤十余政工干部”,“扬州市二月二日下午大雪后,城市及四乡连续发生灾民抢米店事件十余次,少则二十余人,多的有二百余人”,“泰兴城西区马甸乡发生……万余群众抢割芦柴事件”<sup>[16]</sup>,“二月二十日,怀远县梅桥、鲍集、新马桥等三个区九个乡八千余人抢劫公粮六十余万斤”<sup>[17]</sup>。不满情绪的存在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仅加重了灾荒的严重性,而且还影响到中共正在进行的剿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分析了事态的严重性后指出:“救荒是孤立敌人,开展群众性的剿匪和政治攻势的重要环节”<sup>[18]</sup>,主张把救荒工作提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来看待。

此外,有一些地主、富农利用灾荒,农民无力经营土地的机会,重新聚敛土地,影响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土改成果的巩固。在没有完成土改的地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由灾区农民来承担。地主和商人等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自然灾害对他们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他们凭借着充裕的资本积累和有利条

件,往往趁火打劫。当饥饿的灾民没有生活来源时,地主便开始靠手中的资本榨取更高额的利润或者重新聚敛土地。1951年内务部《关于防止和克服春荒的指示》指出:“逃荒、乞讨、吃青、卖牲口农具者时有发生,中南区遭春荒威胁的已达 120万人,甚至有饿死人的地方,这是不可忽视的严重现象。”<sup>[7] 79</sup>逃荒和死亡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而卖送牲口和农具,则意味着生产工具的丧失,两者的丧失给地主和富农重新聚敛土地或诈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机会。另外,“有些富农乘机活动,拉拢落后中农,低价雇短工。有些参加了互助组的中农怕困难户向他们借钱借粮,又看到许多灾民做短工,认为忙时雇短工比较合算,因此首先愿意散伙单干”。<sup>[19]</sup>加上部分组员各投亲友,有的四散逃荒,无劳力的在家等救济,给当时的土改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来了较大冲击。在此情况下,党及时采取措施,提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口号,教育干部和群众认识生产救灾与互助合作的关系,并在组织抗灾救灾中,巩固、发展了互助合作事业。

### (四) 灾荒与党的工业现代化战略的关系

早在19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的目标。他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从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sup>[20]</sup>从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实质上是实现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就正式提出了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战略任务。由于苏联等因素的影响和中国特殊的国情,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发展工业化方面,选择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农业和农村对于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来源于农业,另一方面,在当时新中国遭到外部封锁、外销不畅的条件下,农村是城市工业品的最大市场。“没有发达的农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工业”。而灾荒的发生使得因战争破坏而低下的生产力雪上加霜。仅以旱灾为例,1949—1956年,全国因灾减产粮食达 2262万吨,其中1953年达到了 544.7吨,<sup>[6] 184</sup>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也因此更加低落。著名实业家吴羹梅在《对于辅导私营企业克服困难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出:“靠外销的商品受封锁的影响,内销的由于土改尚未完成,去年又有灾荒,农村购买力低落……市场自然萎缩。”<sup>[8] 98</sup>周恩来在谈到救治灾荒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时指出,“农业的恢复

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sup>[21]</sup>, 如果防灾工作做不好, 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 只有“农业生产提高了, 原料增加了, 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sup>[22]</sup>。可见, 灾荒的发生不仅影响农业和农村, 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党的工业化战略能否按计划发展。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的救灾举措

##### (一) 大力发展副业生产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 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救灾政策和措施。内务部长谢觉哉指出, “我们不是把救灾看作只是‘赈救’, 而是把它看做是一系列的对灾荒斗争的工作”<sup>[23]</sup>, 是通过发展生产以自救。在发展副业生产上, 中央政府提出了“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口号, 并提倡群众互助、自由借贷、变死钱为活钱等办法, 以解决资金缺乏的困难。对生产者采用先行贷粮, 后收成品; 对贩运者采用先行贷货, 后收货款。各地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与各方订立合同, 推销土产。如 1949—1950 年, 河北省与中央贸易部订有贷粗粮换细粮 1.2 亿斤的合同, 由贸易部先付粗粮, 麦收后再收回细粮。该省还与中央合作事业局订有收购土布 5 000 万平方尺, 皮硝 3 000 万斤的合同, 与东北订有收购火硝 50 万斤的合同。有了资金和销路的保障, 各地副业生产开展比较顺利, 发展很快。1951 年 2 月, 河北重灾区“开展起副业生产的户, 达总户数的 50% 左右; 成绩特别好的村达 60% 到 70%, 个别有基础的村达到 80% 到 90%”<sup>[3]36</sup>。副业生产的开展, 增加了灾民的收入, 提高了灾民自救的能力。

##### (二) 以工代赈, 使用灾民的劳力从事建设

以工代赈具有救灾和建设的双重性质, 可以实现政府和灾民的双赢, 因此成为历朝历代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写于将近 300 年前的《廉济录》曾对“以工代赈”有两处精辟的论述: “官府赈给, 安能饱其一家? 故凡城之当修, 池之当凿, 水利之当兴者, 召民为之, 日授其值。是于兴役之中, 寓赈民之惠也”。“兴修水利, 令民口有食而家有粮, 非目前之善策乎? 兴修之后, 堤塘坚固, 沟洫分明, 田事赖以不损, 非永远之善策乎?”<sup>④</sup>这两段话虽然没有使用“以工代赈”这样明确的文字概括, 但对这种做法实质上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倡导。相比较简单的“放赈”, 这是一种更注重实际效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的救灾办法。

新中国建立初期, 由于经济十分困难, 中央政府在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 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1949 年, 苏北制定出兴修水利三年计划, 第一年拨出粮食即达 2.3 亿斤。这一伟大的治水工程, 不但

能解决救灾问题, 而且是苏北的重大建设。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通过关于大力兴修水利的决议, 政府拨出的以工代赈及救济粮截至 1950 年 2 月已达 2.7 亿斤。山东水利与治黄工程, 仅 1950 年前 3 个月份拨款粮已达 1.2 亿斤。平原拨出治黄粮 3 000 万斤。中南区拨了 4 亿斤粮食, 大部用在灾区的以工代赈和救济上。<sup>[24]</sup>凡可能由灾民从事的工程, 尽量雇用灾民, 相比较单纯的救济, 这是一种积极的救灾办法, 各地都收到很大成绩。实施以工代赈的河北省最大水利工程——潮白河下游工程、金门渠工程, “解决六十万人一个月的生活, 灾民中有‘救命堤’的反映”<sup>⑤</sup>。

##### (三) 实行节约互助

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人民解放军自动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 有的机关甚至每日每人节约四五两粮, 有的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关于城市对农村的支持, 谢觉哉指出: “只有农村战胜了灾荒, 逐渐达到丰足, 城市才能更快地恢复起来。”因此, 他提出: “我们希望城市人民继续发扬友爱精神, 热烈响应救灾募捐运动。”<sup>[25]</sup>通过在各大城市进行的救灾劝募, 以及在乡村进行的一碗米救灾运动, 救灾物资短缺的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 仅以河北省为例, 到 1949 年底“共募集粮 1 255 万余斤, 衣、被、鞋、袜十三万余件”<sup>⑥</sup>。与此同时, 中央及各大行政区也拨出大批粮食, 支持灾区生产和进行救济。

除了积极做好救治工作外, 中央政府还十分重视对自然灾害的根治, 从源头上抑止自然灾害的发生, 1950 年 7 月至 9 月, 毛泽东连续四次作出指示, 要求根治淮河, 表明了对根治水灾的重视和决心。

综上所述, 新中国建立初期, 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抗灾救灾运动, 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比较近代社会而言, 已大大减轻。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 灾害仍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破坏, 研究这段时期的灾荒对社会的影响, 有利于更加全面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

#### 【参考文献】

- [1] 傅筑夫, 王毓瑚. 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96
- [2] 李文海. 历史并不遥远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12
- [3] 叶宗宝.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 [J]. 晋阳学刊, 2008(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 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58
- [5] 王子平. 灾害社会学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4

- [6] 范宝俊. 灾害管理文库: 第 4 卷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7] 民政部政策研究室. 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二 (内部文件) [G]. 1984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 [9] 高冬梅. 1949—1952 年中国社会救助研究 [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 [10]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54
- [11] 曹应旺. 周恩来与治水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15
- [12] 汉中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汉中市志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127
- [13] 温艳. 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 [J].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4).
- [14] 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 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 [M]. 上海: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1: 25
- [15] 刘少奇. 关于救助河北阜平、曲阳等老区灾民问题的批语 [M] // 刘少奇.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 3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78
- [16] 华东局关于苏北泰州分区连续发生群众性骚动事件的通报 [J]. 斗争, 1932(30): 52
- [17] 华东局关于怀远县发生抢粮事件的处理给皖北区党委的指示 [J]. 斗争, 1932(30): 46
- [18] 新华社. 领导生产救灾渡过春荒团结广大农民肃清土匪 [N]. 人民日报, 1949-07-02(3).
- [19] 曹云升. 救灾和互助合作有矛盾吗 [N]. 人民日报, 1954-10-26(2).
- [20] 毛泽东. 致秦邦宪 [M] //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3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19

- [22] 周恩来. 恢复生产, 建设中国 [M] //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361
- [23] 谢觉哉. 我们能够战胜灾荒 [M] //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721.
- [24] 新华社. 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 董副总理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1950-03-07(2).
- [25] 谢觉哉. 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 [M] //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707.

### 注释:

- ① 根据内务部农村福利司所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 法律出版社 1958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等编著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自然灾害案例 (1949—2004)》等档案资料, 以及《人民日报》等报刊资料整理。
-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所编的《中国灾情报告 1949—1995》,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16-319 页整理。
- ③ 参见《检查报告 (1950 年)》,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07-1-60.
- ④ 参见河北省民政厅《移民工作再次报告》,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35-5-73.
- ⑤ 参见《河北省生产救灾综合报告》,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07-1-60.
- ⑥ 参见《河北省重灾区生产救灾工作视察报告》,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07-1-60.
- ⑦ 参见《雄县救灾材料》,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31-7-4.
- ⑧ 参见范宝俊主编的《灾害管理文库》(第二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92-395 页。
- ⑨ 参见《河北省人民政府党组关于春耕播种及河工工作给党委的报告》,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编号: 907-15-4.

[责任编辑: 王继洲]

##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JIANG Jiwei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China suffered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All kinds of natural disasters brought greater effects to Chinese society: there were many unnatural deaths and blind flow and migration. Some victims were forced to sell the property and children.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was injured. Ecosystems were damaged too. The Party's land reform, suppressing bandits and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could not be conducted smoothly. Therefore, CPC and government took a lot of relief measures,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the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natural disasters; Chinese society; influence